

中國新文壇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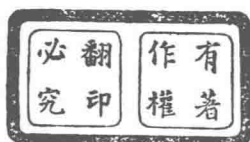
阮无名編



上海南强書局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六月初版發行

中國新文壇祕錄
實價七角五分



總發行所

上海北四川路
公益坊卅八號

南強書局

編者	阮无名
發行者	南強書局
印刷者	南強書局

前記

一九三二年冬，因為要編『現代中國文學史』，從離開了多年的故鄉，把所藏的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書報雜誌，全都帶到了上海。

就在繕檢這些材料的時候，回想當年，不僅感到了恍如隔世，也覺得許多不曾輯集材料，就此埋沒下去，真是可惜的很。

於是，便私自打算，想把其間重要的部分挑選出來，編成一部文獻的書，既可以避免散佚，便檢閱，在文學運動方面，也是很有意義的。

★

如何編輯此書，經過很長時間的考慮。

最先的計劃：想根據這些材料，寫一部隨筆，把各文的精粹部分節要的介紹出來，並寫述一些系統的關於文學運動的史事。

第二回的計劃：爲着要保存這些不易搜集的文學的完整性，想按發表時期的先後排列起來，前面加上一篇說明的長序，就此付排。

第三回，纔決定了現在所應用的方法，即是，根據文學的重要性，決定保存原文的完整與否。對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都加上詳細的說明。文學運動史事片段的敘述，一樣的收進去。這樣的編製，在自己，是認爲比較完善的。

★

在抄寫編校的過程中，有幾件事必須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按照「隨筆，」「談蒼」的條例，排列的順序沒有一定的標準，大抵是想到那件事便寫那件事，想到什麼材料便用什麼材料。

第二，各篇的材料，都是與文學運動有關係的。但爲着調劑嚴肅的空氣起見，有興味的文人趣事也說了一些；這使讀者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以及何以要如此生活，並未全無意義。

第三，因爲祇是一種筆錄性質的書，一種參料的書，對於每一事件，每一文獻，除却偶而的例外自己儘可能的不提出意見，讓讀者自己去批判。

第四，所選用的材料中，也有不完備的部分，特殊是「編目」一類；讀者各藏有該項書籍，抄錄示知，當於再版時補入，以臻完善。

★

總的編輯計劃決定以後，徵得了書局的同意，比即着手進行，陸續付印局排版。到十八篇完成的時候，據書局通知，已達十二萬字上。在量上，沒有再多的必要了，就畫此作爲「前哨」，並略述全書編輯的經過如上。

中國新文壇秘錄

目次

一 前記·····	(一)
二 周作人與Q,阿正傳·····	(一)
三 文字之獄的黑影·····	(八)
四 『讀書雜誌』與『努力』·····	(一五)
五 老章又反叛了·····	(二四)
六 在博士所說的而外·····	(三七)
七 梁任公的晚年生活·····	(五七)
八 林琴南先生的白話文·····	(八〇)

九 幸福的連索·····	(九一)
一〇 孤山的梅花全文·····	(一四九)
一一 郭著小品六章序·····	(一七一)
一二 周作人與革命文學·····	(一七四)
一三 『英雄若是無兒女』·····	(一八四)
一四 北京詩刊的終始·····	(一九五)
一五 新月派的戲劇運動·····	(二一四)
一六 小說月報的創作論特輯·····	(二三九)
一七 最小的問題與最大的發現·····	(二七八)

周作人與阿Q正傳

周作人對於『阿Q正傳』的意見究竟怎樣呢？這問題的提出，我想是很有興味的吧。然而困難得很，在周作人的著作裏，找不出他對於魯迅這一篇小說的意見。他的最初的批評集『自己的園地』（一九二三）裏沒有，他的最近的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九三二）裏，雖然第五講是『文學革命運動』，講到『新青年雜誌的刊行和文學革命問題的提出』，講到『舊勢力的恐怖和掙扎』，却也沒有提到魯迅的小說。在李何林編的『魯迅論』裏，同樣的沒有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真的沒有寫過『阿Q正傳』的批評嗎？這完全不是事實。在本篇裏，我要介紹的就是周作人對於在中國新文學史上佔着重要地位

的「阿Q正傳」的批評。

在中華圖書館協會刊行的「文學論文索引」（一九三二）第一面，就有如次的說明：

自己的園地 仲密 晨報附刊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二日

【內容】評下列作品：（1）自己的園地，（2）文藝上的寬容，（3）國粹與歐化，（4）貴族的與平民的，（5）詩的效用，（6）古文學，（7）阿麗思漫遊奇境記，（8）阿Q正傳，（9）沈淪，（10）王爾德童話，（11）歌謠，（12）文藝上的異物，（13）論小詩，（14）？（15）謎語，（16）文藝的統一，（17）你往何處去，（18）冤僕傳，（19）情詩。

這目次很明白的寫出了「（8）阿Q正傳」而這「阿Q正傳」評，在兩種版本的「自己的園地」（「自己的園地」最初由北平晨報社印行，爲「晨報社叢書第十一種」後改編內容，改由北新書局發行）裏，是都被刪却的。爲什麼？這沒有主觀的猜測的必要，總之，被刪去就是了。爲着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事實是非保留起來不可。我把全文抄錄在下面：這篇批評，是發表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九日的「晨副」上的：

我同『阿Q正傳』的著者是相識的，要想客觀的公平的批評這篇小說似乎很不容易，但是因為約略知道這著作的主旨，或者能夠加上一點說明，幫助讀者去了解他的真相，——無論好壞——也未可知。

『阿Q正傳』是一篇諷刺小說。諷刺小說是理智的文學裏的一支，是古典的寫實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的是負的。然而這憎並不變成厭世，負的也不盡是破壞。美國福勒忒在『近代小說史論』中說，『關於政治宗教無論怎樣的說也罷，在文學上這是一條公理：某種的破壞常常即是唯一可能的建設。諷刺在許多時代，如十八世紀的詩裏，墮落到因襲的地位去了……但真正的諷刺實在是理想主義的一種姿態，對於不可忍受的惡習之正義的憤怒的表示，對於在這混亂的世界裏因了邪曲腐敗而起的各樣侮辱損害之道德意識的自然的反應……其方法或者是破壞的，但其精神却還在這些之上。』因此，在諷刺裏的憎也可以說是愛的一種姿態。『摘發一種惡即是扶植相當的一種善；在心

正燒的最熱，反對明顯的邪曲的時候，那時他就最近於融化在那哀憐與恐懼裏了——據亞里士多德說，這兩者正是悲劇的有淨化力的情緒。即使諷刺是冷的，如平常變爲反語的時候大抵如此，然而他仍能使我們爲了比私利更大的緣故而憎，而且在嫌惡卑劣的事物裏鼓勵我們去要求高尚的事物。」所以諷刺小說雖然與理想小說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的，不過正負不同罷了；在技工上，因爲類型描寫的緣故，也有一種相似的誇張的傾向，這不能說是好處，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實。理想家與諷刺家都著眼於人生的善或惡的一方面，將同類的事物積累起來，放大起來，再把他複寫在紙上，所以他的結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惡的擴大圖。作成人生的「實物大」的繪圖，在善人裏表出惡的餘燼，在惡人裏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偉大的寫實家纔能夠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容易流入於感傷主義的小說，正如人家講中和的容易變爲調停派一樣。所以不是因襲的諷刺文學也自有其獨特的作用，而以在如現代中國一般的昏迷的社會爲尤甚。

『阿Q正傳』裏的諷刺在中國歷代文學中最爲少見，因爲他多是反語（Irony），便

是所謂冷的諷刺——「冷嘲」中國近代小說只有『鏡花緣』與『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有點相近，『官場現形記』和『怪現狀』等多是熱鬧，性質很是不同，雖然這些也是屬於諷刺小說範圍之內的。『阿Q正傳』的筆法的來源據我所知道是從外國短篇小說而來的，其中以俄國的戈果理與波蘭的顯克微支最爲顯著日本是夏目漱石森鷗外兩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響。戈果理的『外套』和『瘋人日記』，顯克微支的『炭畫』和『會長』等森鷗外的『沈默之塔』都已經譯成漢文，只就這幾篇參看起來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跡；夏目漱石的影響，則在他的充滿反語的傑作『我是貓』，但是國民性實是奇妙的東西，這篇小說裏收納這許多外國的分子，但其結果，對於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陸的迫壓的氣分而沒有那「笑中的淚」，對於日本有了他的東方的奇異的花樣而沒有那「俳味」，這一句話我相信可以當作他的褒詞，但一面就當作他的貶詞却也未始不可。多理性而少情熱，多憎而少愛，這個結果便造成了 *Satyrical* (*山靈*的諷刺)，在這一點上却與「英國狂生」斯威夫德有點相近了。這個傾向在『狂人日記』裏——我在這裏不得

不順便聲明，著者巴人與魯迅本來是一個人——也很明顯，不過現在更爲濃密罷了。這樣的冷空氣或者於許多人的薔薇色的心上給予一種不愉快的接觸，但我的私見以爲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國現代社會裏。

阿Q這人是中國一切的「譜」——新名詞稱作「傳統」——的結晶，沒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會的因襲的慣例爲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現社會裏是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小說月報」上說，「阿Q這人要在現社會中去實指出來是辦不到的；但是我讀這篇小說的時候，總覺得阿Q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呀！」這話說得很對。戈果理的小說「死靈魂」裏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尋到一個旅行着收買死農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種種投機的實業家中間可以見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魯泡金所說。不過其間有一點差別：契契珂夫是「一個不朽的萬國的類型」，阿Q却是一個民族的類型。他像神話裏的「衆賜」(Pandora)一樣，承受了惡夢似的四千年來的經驗所造成的一切「譜」上的規則，包含對於生命幸福名譽道德各種意見，提

煉精粹，凝爲個體，所以實在是一幅中國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寫中國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知尊重生命，尤爲痛切，因爲我相信這是中國人的最大的病根。總之這篇的藝術無論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樣老實不客氣的表示他的憎惡，一方面對於中國社會也不失爲一服苦藥，我想他的存在也不是無意義的。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痛罵一頓，做到臨了却覺得在末莊裏阿Q還是唯一可愛的人物，比別人還要正直些，所以終於被「正法」了；正如託爾斯泰批評契訶夫所說，他想撞倒阿Q，將注意力集中於他，却反將他扶起了。這或者可以說是著者的失敗的地方。至於或者以爲諷刺過分，『有傷真實』我並不覺得如此，因爲世界往往『事實奇於小說』，就是在我的灰色的故鄉裏，我也親見到這一類腳色的活模型，其中還有一個縮小的真的可愛的阿桂，雖然他至今還是健在。

文字之獄的黑影

最近，從北平買來了一本棉連紙的『劉半農所藏，星雲堂影印，的』初期白話詩稿，
『在編者的序引裏，有這樣的幾句話：

『……黃侃先生還只是空口闊闊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却要於作文反對之外，借
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爲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
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中過活。』
像這樣的事實，在當時的首都的北京，是不止一次發生的。『努力』三十六期（1923，
1.7）裏，就告訴過我們，『國務會議』裏，曾經有「取締新思想」的議案。而不記得是那

年的大報裏，也有驅逐胡適等出京的電文。諸如此類的事，若細細的查考起來，是很有足述的。那時的胡適的態度，『頗有足嘉。』他說，『我是不跑的。生平也不知躲避危險。封報館，坐監獄，在負責任的輿論家眼裏，算不得危險。然而『跑』，尤其是『跑』到租界裏去唱高調，那是恥辱！那是我決不幹的』（1923, 1, 5）。可惜，這一位『先驅的硬漢』到了十年之後，竟變成出賣靈魂者，變成迴護帝國主義利益的人了。劉復與陳衡哲回顧『初期白話詩稿』有『三代以上』的感想，胡適的行動，多少也會令人有『隔世之感』罷，雖然在他的思想系統上，這是必然的。

『實力』的威壓，不僅在對人一方面的，同樣的在對出版物一方面，在當時如此，在一九二四年後仍舊是如此。這裏不妨抄出胡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寫給『國務總理』張國淦的信，這信是揭載在同年七月六日的北京『晨報副刊』上的，後來不曾收集：

乾若先生：

六月八日見着先生和少川先生時，曾以警廳禁賣『胡適文存』的事奉詢，蒙先生

允爲訪問；過了兩天，夢麐先生代達尊意，說已代詢過內務部及警廳，據云，『胡適文存』及『獨秀文存』並未曾禁賣；並云，前次向各書店收去檢閱的書，均已發還原店了。當時我自然很覺得滿意；但迄今已近一月，而警廳仍在干涉各書攤，不許他們發賣這兩部書，前次沒收的書也並不曾發還。

我曾把先生轉告的話說給一兩家書攤掌櫃的，他們信以爲真，就試把一兩部『胡適文存』擺出來看看。不料各區警察署仍派便衣偵探干涉此書，不准售賣。

我想再奉托先生再爲一問，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麼機關作主？究竟我的書爲什麼不許售賣？禁賣書籍爲什麼不正式佈告該禁的理由？爲什麼要沒收小販子出錢買來的書？（我所知道的，南城有一家書攤被收去『胡適文存』三部，『獨秀文存』七部。西城錦什坊街有一家被收去兩種文存約十幾部。）

我很盼望先生替我一問，因爲現在各書攤的掌櫃疑心我說謊；我既然不能疑心夢麐先生和先生說謊，自然只好請先生再爲一問了。